

ZHONGGUO
XIEZUOLILUN
JIPING

刘锡庆 主编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中国写作理论辑评



现代部分

INJIPING

H152/208

写作理论研究丛书

中国写作
理论辑评

现代部分

刘锡庆

主编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RBA20/04



21242144



1242144

中国写作理论辑评
现代部分
主 编 刘锡庆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通辽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5.25 字数：320 000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120册

ISBN 7—5311—1464—X/G·1272 (压膜) 定价：5.70元

整理中國古今有實寫
作的理論以及外國的
有關資料，這對於寫作
學的建立與寫作實踐，
都是大有裨益的。

臧克家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
于北京

写作理论研究丛书

顾 问	臧克家			
主 编	刘锡庆			
副主编	王志彬	松 迪	蔺羨璧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志彬	刘锡庆	任公伟	任文贵
	朱宝恒	李保初	佟德真	林三松
	松 迪	胡志霄	郝季光	曹玉梅
	温中和	甄 瑛	蔺羨璧	

中国写作理论辑评·现代部分

主 编 曹玉梅

副主编 任文贵

编写者 (以姓氏笔画为序)

任文贵 李静梅 郑学诗

姚 健 郝全梅 曹玉梅

总 序

刘 锡 庆

不论是眼光敏锐者还是感受迟钝者，现在都已不难看出：伴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文章，作为信息的载体，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青睐；写作，作为信息的制作，越来越受到全人类的重视；“写作热”，正在世界范围内勃然兴起。

这是不可逆转的、发展的“大趋势”之一。

作为世界上最早发明了造纸和印刷术、创造了古代东方灿烂文明的炎黄民族的子孙，站在历史发展的这一重要关口上回顾、思索，真有万千感慨！我们这个闻名于世的文章泱泱大国，近两千年来走过的恰恰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留下了一个明晰的“之”字形足迹：由“经国大业”、“以文取士”一变而为“声光化电”、“重理轻文”，这是一次重大的激变；再由此演化为“信息社会”、“文字密集”，这是目下正在进行中的、更为深刻的另一次转化。转化，即后者对前者的积极的扬弃与否定。每一次转化，固然有旧亡的痛苦，但更多的则是新生的欢乐。历史，正是在这转化与否定之中开辟着自己不断前进的道路的。

在信息社会里“文章”的写作既然作为“信息之源”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对文章写作的深入、细密研究就成了客观的一种需要。现代的、科学的“写作学”的建设，就是在这样的客观背景下提出并开展起来的。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绩，但问题确实不少。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闭目塞听，观念陈旧，不愿进取，抄来抄去，辗转相袭，未下功夫，一知半解，急于趋新，

不能“实战”，轻视传统，疏于学习，没有“根基”。因此，写作的书出的实在不少，但相当一部分确较平庸。所以，目下之急在于摸清“家底”，弄明“现状”，放眼“世界”，切实地做好学科建设的“奠基”工作。如果对写作的历史和现状“一团漆黑”，对本国传统和外国情况“若明若暗”的话，那么，现代的、科学的“写作学”的建设，势必会成为一种动听的空话。

我们这套丛书就是为着写作科学理论“奠基”的目的而编写的。

它的阅读对象仍很广泛。因为，文章的写作是各行各业的人们都不能离开的。写作能力的获得几乎是现代人“自我完善”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教学和研究者不必说了，要想尽快地提高他们的业务素养、研究能力，舍此实无它途；专业作家或业余写作者也是应当掌握这些知识的，这是他们克服“非学者化”缺欠，提高创作水平、境界的努力方面之一；在校大学生、成人自学者、中小学语文教师、自学写作青年，等等，也都需要了解这些内容，这对他们在各自基础上提高写作水平，乃至开阔眼界、活跃思维、增长知识，做好工作等，都是大有帮助的。

丛书计有五册：“古代”写作理论的辑评，由河北写作学会负责；“近代”由内蒙写作学会负责；“现代”由山西承担；“当代”由天津完成；北京则负担编辑“国外”写作教学概况的专册。华北地区三省二市写作界的同仁自己发起、自愿联合、分工协作，工作得十分努力。内蒙古教育出版社从上到下鼎力相助，使丛书得以顺利的编辑、出版。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本书顾问、中国写作学会会长臧克家同志，始终关心丛书的编辑工作并慨然为之题辞；著名学者、中国书法协会主席启功先生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对以上所有为本书问世做出了劳绩的同志，我在这里表示深挚的感谢！

现在，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前夜。这是中国历史

上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在改革开放的汹涌洪流中，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世界文化中心的东移、“华夏文化”的重放异彩，其指日可期是定而无疑的！

在这个辉煌历史潮头中做出成绩的，将不是那些浅尝辄止者、沽名钓誉者、华而不实的“风头”人物和有勇乏智的“勇敢”分子，而是那些踏踏实实、沉稳执着、善于继承、敢于创新的实干家。

我们愿为他们铺路、架桥！

愿为“写作学”大厦的构筑填砖、加瓦！

一九八八年元月廿四日

于北师大寓室

前 言

曹 玉 梅

中国现代写作理论始于“五四”运动时期，终至四十年代末期。在三十余年的时间里，先驱们历经了艰苦的探索和实践，终于使写作观念、理论、方法等都发生了极深刻的变化，逐步形成了适合于反映现代生活的理论体系。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条路子，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16年至1927年；第二个时期，1927年至1937年；第三个时期，1937年至1949年。

第一个时期是写作观念变革，语言、文体大解放，写作领域的真正大革命时期。

中国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盘踞在写作理论上的核心观念就是内容上的“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形式上的骈偶、用典、对仗的文言古文。它紧箍了作者的思想和创造精神。文章空洞无物，脱离现实，脱离大多数人。到了“五四”运动时期，由于反帝反封建，提倡科学和民主的革命运动的勃兴，中国古老的紧锁的大门被打开。欧洲、日本的新思想、新观念潮水般涌进，撞击了陈腐的写作观念。许多人眼界顿然开阔，思路活跃，相互砥砺切磋，勇于吸取借鉴，敢于冲破旧传统，以跌宕纵横的气势，觉醒的革新意识，发出呐喊。其中，首先冲出来呼号的是胡适。他在1916年10月《寄陈独秀》信中，第一次提出白话文写作的“八事”主张，并于1917年1月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公开发表。这是文章改革的“雷音”，是向封建传统写作观念挑战的檄文。接

着，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以《新青年》为阵地，张开了文章写作改革的大旗。从此以后，迫切要求白话文革命就成为群体意识。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李大钊、傅斯年等纷纷写文章，支持胡适、陈独秀的改革主张，掀起了白话文革命的第一个浪潮，其具体内容反映在四个方面：

一、以语言和文字为白话文革命的突破口，以白话文为文章之正宗。

胡适、陈独秀、刘半农纵现了欧洲变之又变、新之又新的语言文字变革的历史，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今人不应当用古人死的语言文字写作，活的白话语言和文字应当是现代人的写作工具。胡适提出白话可以写出第一流的文章。文章和说话一样，话怎么说，文章就该怎么写，“言文一致”。只有以白话代替文言的正宗，文章才能可读、可听、可歌、可讲、可记。陈独秀在《答胡适之》中说得更为明确、坚定。他认为以白话文为正宗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商讨的余地。刘半农除赞同胡、陈的主张外，他还提出：废文言，用白话绝非一蹴可及的事。文言不应全盘抛弃，其中和白话相近的浅显的部分也应当吸收，充实白话语言。钱玄同、傅斯年提出，仅是白话还不能写出一等文章，因此在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技等方面可取西洋和日本的款式。这些主张使“白话文”的观点更加明确、完善、无懈可击。总之，语言文字变革之势，锐不可挡，成为不可逆转的大潮。它使白话文革命在发难期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二、文体大解放。白话文革命的出发点，就在于把文章从少数人手中转移到大多数人方面来，这固然和内容有关，但旧形式的禁锢作用也不可低估。

胡适提出在白话文章写作中，“体裁的大解放是第一步”。并第一个尝试用白话做自由体诗。体裁大解放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废除古文的骈丽、对偶、用典的死格式；用白话作诗，作

文，二是恢复小说、戏剧、散文的合理位置，三是应用文和文学之文平等、对称。体裁大解放的观念提出来以后，许多文章都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眼前，尤其是新诗、杂感、随感录的写作更放异彩。

三、内容大变革。白话文革命归根结蒂是反映在“写什么”的问题上。当时，许多先驱把文章内容的革命紧紧地同反对旧制度、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革新政治要和革除帝王权贵、神仙鬼怪的旧文学结合，否则政治革命是不彻底的。胡适提出的文章要“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不作无病之呻吟”等都是为了祛除腐朽文章的痼疾。陈独秀提出推倒雕琢阿谀、陈腐铺张、迂晦艰涩的旧文学，建设平易抒愤、新鲜立诚、明瞭通俗的国民的、写实的、社会的新文学。他主张文章既要反映客观生活，又要有发自内心的独特感受，不载古人之道，不言陈腐之物。这些都充满着改变文章内容的战斗精神。

经过五四运动以后，写作理论研究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趋势，即更加关注对文章内容和写作主体的探索，从而使理论水平朝向较高层次上升。这时周作人首先提出语言文字应当和文章内容相结合而成。如果语言文字变了，思想内容依旧，也算不得新文学。他在《人的文学》中，从人道主义出发，提出白话文应当是人的文学，不是非人的文学。它既要反映人类理想的生活，也要反映人类平常的生活。后一种尤为重要。周作人把文章写作改革引向了内容，引向了宇宙的主体，是继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之后的又一个宣言。他使写作理论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是，今天看来，他的主张仍然缺乏实在的内容，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几个月之后他在《平民文学》中，对“人的文学”又做了具体的论述。他提出文章应当反映平民生活中普遍、真挚的思想感情。“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他所说的“平民”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人群。为了把文章写得真与美的统一，他认为文字改革是第一步，

思想改革是第二步，而后者更为重要。在《个性的文学》中，他又提出了文章要表现自然的与人类相通的有价值的个性。尽管周作人的这些观点有很大的局限，但他重视文章内容、作者思想和个性，这一点是极为可贵的，其影响也极为深远。

随着马列主义思想观点的传播和外国进步思潮的不断引进，对文章内容的探讨也出现了许多新观念。当时，人们对文章的内容和未来显露出极大的热情和关注，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做了有益的探讨。沈雁冰在《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中提出了内容的三要素：普遍性；表现人生、指导人生；为了平民。他把表现对象、内容和社会效果结合起来思考，提出了“为人生”的观点。郭沫若提出了创造“生命底文学”的口号。他主张在作品中应当把“创造人”，增长个人精神放在第一位。这样的作品才具有“二次性”真善美的特质，才是个性的，普遍的，不朽的。西谛在《新文学观的建设》中提出，文章不能以传道、娱乐为目的，而是以表达真挚感情为目的。成仿吾在《新文学之使命》中提出，作者要把内心做为原动力，表现时代生活和思想，“追求文学的全”，“实现文学的美”。到1926年时，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中提出“社会主义内容写实主义形式”的口号。这些文章都反映了认识的不断深化。他们的见解极大地拓展了文章内容的空间，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和思考。

但是，有些作者的理论研究，常常缺乏对写作现状的科学分析和指导，反映在写作实践上，就暴露出虚假的倾向。如有些作者以艺术代替内容，以主观代替客观，歪曲生活，以假相掩盖真实。这是一个理论上必须解决的问题。为此，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从现实主义出发提出了文章要坚持真实性原则的观点。他提醒作者应该大胆地正视人生，写出他的血和肉，不能用瞒和骗来自欺欺人，应该无畏地反映人民的斗争，时代的声音。此时，邓中夏、沈雁冰、恽代英、肖楚女、蒋光赤、郭沫若等提出文章要表现气势磅礴的民族精神，彻底揭露旧世界的罪恶。这些文章对

不良的写作倾向，从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高度都给以积极的匡正。

四、关于写作主体的研究。许多理论家、作家都意识到作者的生活、思想、感情、艺术修养对写作的制约作用。作者自身的能动性、创造力是写作的积极因素。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提出，作者应当是人道主义者，讲人道、爱人类，从个人做起，争取人的资格和价值。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中，从马列主义的高度提出作者要有宏深的思想和理论、坚信的主义。郁达夫从腐败的时代出发在《创造日宣言》中提出，作者要有“真诚的精神和美善的心意”。恽代英在《文学与革命》中强调作者“要先有革命的感情，才会有革命文学的”。郭沫若认为文学和革命是一致的。革命文学家就得扣紧时代神经的弦索，表现时代精神。鲁迅认为“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尽管这些作家的立场和观点不尽相同，提出的主张也各有侧重，但其共同之处是他们都从历史的和时代的角度，从自觉的忧患意识和参与意识角度提出的。他们的追求都是为了使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得认识和表现的平衡条件。

总之，这十年写作领域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变化，是前进的十年，了不起的十年。

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次白话文革命仍然是局限在城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范围内，距现实生活的要求还相差甚远。那时，早期共产党人和进步作家在写作理论方面虽然提出了很多尖锐、新鲜的写作主张，但他们的认识仍有些形式主义和左的过激因素。这些对后来写作理论的发展都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第二个时期是写作内容和形式的理论探讨时期。在这十年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当复杂、尖锐。社会现实决定了写作观念和方法必须有相应的变化。这样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这个时期提出了两个尖锐的问题：一是“写什么”的问题；二是文章

的大众化问题，即“怎么写”的问题。

“写什么”，既是理论问题也是个实践问题。它和中国的现实，作者的世界观、立场、生活有直接关系。当时，有些作家强调文章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强调文章是宣传品。因此，他们主张文章的内容要以劳苦群众的集体为主人公，表现他们的斗争精神，坚决反对把个人做为表现的对象，反对个人主义的文章。他们主张革命作家的文章，一方面要暴露旧势力的罪恶，攻击旧制度；一方面也要促进新势力的发展，这是革命文学的第一个条件。茅盾则认为中国有十分之六的人口是小资产阶级。文章既要反映广大的劳苦大众，但也不应当忽略众多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不能说反映劳苦大众生活就是革命文章，写小资产阶级就罪同反革命。他对左的倾向和盲目追随世界思潮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并反对“标语口号”式的宣传品。他积极提倡作者“应该拣自己最熟悉的事来写”。鲁迅认为文章应当反映中国的实情，既要写熟悉的题材，又不应当苟安于一点，沉默了自己。他认为作者应该放开眼界写出人民大众生龙活虎的战斗，写出时代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鲁迅的主张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为作者广泛地取材，不断地更新写作题材，反映生活的真实拓宽了空间，也为广大作者的写作实践廓清了方向。

文章的大众化问题也是一个有纠葛、争论的问题。最早提出大众化问题的是林柏修。他在《一九二九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中提出，文章要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就有一个大众化问题。此后，“左联”曾集中讨论了三次。第一次是1930年春；第二次是1931年11月到1932年6月；第三次是1934年春。大众化问题的实质是为了克服文章革命以来受外国思潮的影响而产生的新式欧化倾向。这种倾向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可是当时有的人却认为群众不能理解文章的内容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水平太低，因此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鲁迅对这种看法给以严

厉的批评。他主张在教育不平等的社会里，写文章应为大众设想，多写些浅显易懂的文章，使大家都能看懂爱看，挤掉那些陈腐的劳什子。郭沫若提出大众化就是无产阶级文艺的通俗化。1931年“左联”响亮地提出“大众化”的口号，并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必经之路。它号召作者在选材、观察生活、文字表达、体裁的运用等方面都要时代化、工农化。后来，瞿秋白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文中，对大众化问题做了全面的论述。首先，他把文章的大众化和为谁服务的问题联系起来，提出文章应当为千百万劳动群众服务的观点。为此，作者应当到工厂、农村、前线去，“跳过那一堵万里长城”，彻底克服轻视群众、脱离群众的倾向，这是解决大众化的前提条件。其次，他认为不能用古文、“五四”式白话和章回体白话写作，而应当用读出来听得懂的，真正“现代话来写”。他积极主张作者应以现实主义方法写有艺术价值的鼓动文章，描写工人、贫民、农民、士兵的生活和斗争，暴露绅士地主阶级的丑恶、狡猾、残酷、崩溃和腐化。这种文章才能帮助大众认识人生，得到思想上的武装。在形式上，他主张既要创造单纯、明快、朴素的新形式，又要利用群众熟悉的旧形式。瞿秋白吸收了列宁的观点，立论有一定高度。但他在强调大众化时，对“五四”文学传统否定过多，影响了大众化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茅盾、陈望道则非常强调表现技巧和语言的大众化。茅盾认为“真正现代中国话”目前还不存在，在描写上也不够用，只从语言角度解决大众化问题是无效的。因此大众化的动人的文章应当“技术是主，文字是末”。陈望道认为大众化语言应当是以大众说得出口、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为标准，用这样语言写的文章才是大众化的。这次讨论非常热烈，百家争鸣，各抒己见，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他们的积极探索、追求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为进一步解决文章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奠定了基础。

第三个时期是写作理论深化时期。在烽火连天，血染山河，整个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最初岁月，写作曾一度出现清冷、寂寞的局面。但在写作理论方面却一直为许多理论家、作家所关注。

首先，关于文章的题材处理和社会作用问题。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革命作家到民间去，到军队中去，边战斗边写作，揭露暴日的罪行，喊出了民族命运的危机。当时，最突出的写作观点就是文章要随着枪炮一齐打到敌人身上去。在文章是战斗的“武器”的号召下，战地诗歌、通讯、报告文学异常活跃，这些文章数量多，作者队伍越来越大，但在质量上存在着不少问题。由于作者急于反映壮烈的场面和题材，所以只重写事，不重写人。文章极单调、贫乏。茅盾在《论加强批评工作》中，针对这种现象提出了典型化原则问题。他认为典型人物既包括在抗战中产生的新人，也应包括在抗战中产生的新的荒淫无耻、自私卑劣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应当是全面的，不该是“半面的现实”。此外，在题材的处理上他主张要写出人物性格来，即使重大题材也要以人为主。周扬在《我们的态度》中提出现实是多样的，作者和读者是多样的，作者在反映生活时也应当多样化，不能有定于一尊的模式，在取材、表现方法、风格、语言等方面作者都应发挥积极创造精神。这些写作原则对反映生活的本质，提高文章的质量，增强文章的艺术效果等方面都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在战争的历史条件下，“武器”论的观点是难以动摇的，它以强大的优势影响着作者的思想，到了四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从理论上又做了概括，使“武器”论的观点，从写作实践到批评标准更加系统化、正宗化了，主宰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由于在理论上过分强调文章的政治效果，因此，许多作者忽略了文章自身的内在特殊性，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其次，关于文章的民族化形式问题。自“五四”运动以来，对文章的形式，不只一次的争论过。每一次争论都推进了文章形式的